



## 只用英语的欧洲？还是...

Robert Phillipson 2003. *English-Only Europe? Challenging Language Polic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40 p.

刘海涛  
[htliu@yeah.net](mailto:htliu@yeah.net)

全球化的热潮正席卷世界。英语借此机会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领地。越来越多的人，心甘情愿地把英语的学习当做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来做，对他们而言，掌握英语似乎就意味着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有的人说语言只是一个工具，多会用一种工具没有什么坏处，进而对英语目前的发展态势持无所谓的态度。有的人说一种语言的强势发展，势必会破坏人类语言的整体生态环境，鉴于语言与人权、文化等人类生活中的其他事物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应该对此问题视而不见，而应采用客观的方式来分析全球的语言状况，以便寻求一种理性的解决办法。

大量的事实说明，人类对于自己语言、文化等精神领域的产品重要性的认识，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与人类在物质方面的发展水平有关的。我们很少见到一些处在发展中国家的人谈论语言人权或语言生态的问题。但从另一方面看就是一个非洲部落的酋长也知道，学会使用英语、法语或者西班牙语，会比只是出于保护目的，而使用自己的语言，要来钱的多（Fill 1993:17）。既然如此，我们好像大可不必为这些追求幸福的人着急。遗憾的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语言、文化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难以再生的资源<sup>1</sup>，人类没有理由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永远离我们远去。出于此，今天有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特别是社会语言学家，将自己的目光放在了语言生态上，放在了语言多样性上，放在了语言人权上。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欧洲在世界上都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有人说，在遍及全球的语言保卫战场上，欧洲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一块阵地了。如果欧洲失陷，那么世界就是英语的了，与此同时，上帝也会在同一天里宣告巴比塔的建成。多好的景致啊！我们似乎没有什么理由为保护语言、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而战。语言对于人类真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吗？我们为什么要将“救世主”说成是“谋杀者”

---

<sup>1</sup> 生态学家 Sutherland (2003) 新近在“Nature”上发表了一篇采用关于语言消亡和物种灭绝关系的文章。他按照国际通用的研究物种灭绝的指标和方法，分析了 6809 种语言的生存状态，并比较了语言、鸟类和哺乳动物在灭绝过程的异同。数据表明，人类语言消亡的速度到高于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灭绝。他的另一个结论，也值得我们深思：在那些语言濒危和消亡现象最严重的国家，濒临灭绝的鸟类和哺乳动物也要多于其它国家。

呢？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请参考 Kontra（1999）Maffi(2001), Skutnabb-Kangas,(2000)。在此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是一本描述欧洲战况，以及为了取得胜利，欧洲方面下一步应该采取何种战略方针的手册。

作者 Robert Phillipson 现为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英语系教授，是国际著名的语言人权和语言政策学者，其代表作是“语言帝国主义”（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本书是作者最新推出的全方位研究欧洲语言问题的力作。作者希望能够在欧洲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诸因素构成的坐标系中，探求语言政策、语言运用、语言学习和语言权利等的坐标点。通过客观细致的分析，寻找一条通向基于平等的语言交流之路。

全书共有六章和五个附录组成。限于篇幅，我们只能介绍本书的一些主要内容。

第一章的标题为“放任自流语言政策的危险”。作者认为目前欧洲联盟组织和相关国家，采用的语言政策基本上可以归为**放任自流**一类。为了说明这种放任自流方针的不可取，作者首先列出一些欧洲语言政策必须给予解决的问题，如：英语作为全球化主要语言是如何影响欧洲大陆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方针的？是如何影响就业、人员流动以及个人自由的？欧盟机构的现行语言交流方式赋予某些母语为“顶级”语言的人一定的特权，如：英国人和法国人，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讲加泰罗尼亚语、威尔士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没有权利在欧盟机构中使用自己的语言，这是否意味着只有个别语言有权参与**欧洲**的建立？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又怎么来理解欧盟的座右铭“在多样性中发展”（Strength in diversity）？欧洲人引以自豪的“多语性”还会存在吗？毫无疑问，在政治、商业、文化等诸多领域中，人们需要一种实用的跨语交际方式，但是我们是否由此就有理由忽视潜在的问题和矛盾呢？英语或其他有影响的外语的学习和使用，真的不会对其它语言造成威胁吗？统一的欧洲在制订自己的语言政策时，是否应该多角度、多层次，严肃、系统地考虑这个问题呢？为了制订一个切合实际的语言政策，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p.1-2）。欧洲统一进程的加快和不断深入，信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语言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只有建立在平等交流基础之上的语言政策，才有可能保证所有语言和民族共同发展。为此，必须采取一种积极的语言政策，而不能像现在这样让语言问题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

“英语到底是在统一欧洲，还是分裂欧洲？”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问题。作者用大量事实说明，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由于交流的需要，确实强化了英语的影响和地位，但这是以牺牲所有其它欧洲语言为代价的。同时，作者也提到像法国采用的那种被动的语言保护措施是不够的，而应该寻求一种综合的疗法。欧洲各种组织自建立以来一直将成员国的“语言平等”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例如，在2001的“欧洲语言年”决议草案中就明确提出“从文化的角度看，所有的欧洲语言都具有相同的价值和尊严”（附录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洲联盟具有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笔译和口译服务部门，同时也有专项资金用于维护欧盟内部的“语言多样性”。即便如此，由于人力物力方面的限制，这种语言的平等性在内部仍无法完全实现。作者在此列出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了质疑。欧元的启用，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在各个领域的统一进程。现在欧洲联盟有了一个共同的市场、一个共同的商务策略、一个共同的防务政策、一个共同的农业政策，但是很遗憾，还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政策。假如有一天，上面说的这些“共同”成为真正的现实，那么没有一个共同语言政策

的欧洲，是不可想象的。换言之，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呼唤能够切实解决“超国家”层次语言问题的语言政策。

什么是语言政策呢？作者引用一份德语报纸的说法是“一种对可能由语言问题引起的伤害行为的预防性措施”，语言政策是社会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像欧盟这样“超国家”机构语言政策的制订，在世界上几乎没有先例。所以作者希望通过回顾和总结国家一级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活动来归纳出一些可供欧盟借鉴的经验和方法。在简要举例说明了语言规划中的“本体”、“地位”和“获得”<sup>2</sup>规划后，作者认为语言规划本身属于语言社会学的研究和行为范畴，在进行语言规划活动时，需要考虑经济、人口、教育以及语言学等方面的因素。作者在此没有对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作专门的区分。语言政策和多个政府部门的决策有关，大多数欧洲国家没有专门的政府部门来负责语言政策事务，有关语言问题的决策部门一般涉及以下有关部门：文化、商务、外交、教育和科研。通过对国家级语言政策制订的讨论，我们不难看到对于欧盟这样非国非邦的政治混合体来说，语言政策牵涉的领域很多，几乎涉及EU的各个领域，决策更加困难。但是困难绝对不是放任自流的理由，单由语言市场来决定语言政策，后患无穷。欧洲组织语言政策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人们常常把语言视为一种纯实用、纯技术的工具；另一方面，语言又和个人、集团、国家象征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语言问题这种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本质，使得许多政治家和学者，对此问题是敬而远之。这样做的结果，直接导致了现在欧洲机构放任自流的语言政策，让英语有了乘虚而入的机会和可能。各方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保护既得利益方面，对于未来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和目标。作者列举了1999年由芬兰组织召开的一次部长级非正式会议，按照惯例这样的会议一般采用举办国的语言，以及英语和法语，会议只提供这三种语言间的口译服务，德国要求会议也应该采用德语，否则拒绝参加会议。芬兰一开始拒绝了德国的提议，后迫于压力，接受了德语。而其它的“大语种”，如西班牙、意大利，只能和“小语种”为伍了。这一事件说明欧洲组织的语言政策一般是建立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用原则上的，而非建立于语言权和民主平等之上。事后，芬兰总理在接受一家德国报纸的采访时说：“我本人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德语在原则上应该具有和其它“大语种”同样的权利。因为联盟（EU）的语言问题处于无计划发展状态，所以这只是一个实践中的问题。我们大家应该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p.22）从这一段话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事实和问题：欧盟没有一个有计划的语言问题解决方案，“大语种”的国家和人民比其它语种的人享有更大的权利，我们也不明白没有计划的问题怎么就是一个“实用”问题呢？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看，我们认为欧盟目前的语言政策是一种“鸵鸟”政策，这种“放任自流”、“安于现状”的语言政策之中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和危机。如果注重人权、维护语言文化多样性只是停留在书面的美丽话语，如果欧盟没有切实的政策来保证对所有语言权利的尊重，那么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乔治·奥威尔笔下“动物庄园”的景象，即：“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要比其它动物更平等”。做一个简单的替换练习，将“动物”替换为“语言”，就会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而这样的社会和联盟，注定不会是绝大多数人所期待的，不能代表广大欧洲人民的利益。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问题解决策略和计划。面向未来，绝对不意味着忘记过去，只有充分了解过去，我们才能制订出切实的、符合未来发

---

<sup>2</sup> 其中的“获得规划”（Acquisition Planning）指的是依据官方教育部门的规定，各级教育机构采取的有关语言学习方面的措施。有关语言规划的问题，可参考Cooper（1989）。

展的策略。本书第二章从多种角度探讨了欧洲语言的过去，以下是本章各小节的标题：巴比塔一福还是祸？欧洲一览，欧洲语言的谱系，古典的承传，英语是新的拉丁语吗？语言和民族主义，语言至上思潮，从国家到超国家，多样性和共同的文化遗产。语言的多样性，对于人类到底是祸还是福，是每一位研究语言人权和语言多样性问题的学者都难以回避的问题。我们自己多次重复过这样的想法，即：如何在保持语言多样性的前提下，利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造福人类。这可能是现代社会发展对所有政治家和学者提出的挑战。事实上，这种挑战古已有之，只不过这种矛盾在今天更为突出罢了。圣经《旧约》中巴比塔的故事，告诉我们语言多样性是上帝为了遏制人类的发展和强大，而有意为之的，但是《新约》里的相关内容却充分说明文化与民族的多样性是至关重要的。按照欧洲的价值观念和至少欧洲有关组织支持的语言多样性维持行动来说，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种福，而非一种祸。近几年，在全球社会语言学界兴起对于濒危语言、语言多样性、语言人权等问题的研究热潮，同样说明语言的多样性对于人类而言是一种福祉。通过这一章的内容，我们对于欧洲目前的语言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语言分布的形成是语言学、地理、文化以及政治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作者将拉丁语和英语从几个方面做了比较，这对于我们了解共同语的一般属性很有帮助。两种语言共享以下特性：二者都有足够丰富多彩的书面语作品；二者均可存取重要知识和运用在关键领域，如：宗教、科学、医学、历史、政治、法律...；它们都可用于跨越国界的交流；在许多国家的学校里，它们都会被学习多年。在它们之间，也有以下不同：在拉丁语大行其道之时，它事实上已经不再与任何特定的政治或经济体系相连了，也不是任何人的母语了，而今天的英语却不具备这一性质；现代技术和通讯手段的发展，使得英语在今天行使的功能要远远大于过去的拉丁语。（p. 40）对于作者提到的这两种语言的共同性，我们不再多说了。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二者的不同：拉丁语对于人类生活其它领域的渗透要弱于今天的英语，它的作用似乎只是一种交际的工具而已。拉丁语的中立性能够保证双方的交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而这一点正是我们为什么排斥英语的主要原因。从这一节里，我们还可以学习到许多看似有趣，实则寓意深远的故事，例如：在 1971 年法国总统蓬皮杜在接受 BBC 的采访时说：“法语是欧洲人民的自然语言，英语只属于美洲”。次年，在英国答应法语在欧共体的地位不做任何挑战之后，蓬皮杜总统同意英国加入欧共体，而首相希思派驻共同体的工作人员也都个个精通法语。纳粹德国的副元首 Rudolf Hess 预言，英语会“沦为一种微不足道的、没有世界影响的日尔曼方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受纳粹德国向海外推广语言和文化之成功经验的启发，英国在 1934 年建立了 British Council，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今天这一组织已成功地将英国的语言和文化作为一种产品出口到了全世界。这些事例不仅说明语言的国际地位是随时间而变的，而且也说明欧洲语言问题的错综复杂，欧洲各国对自己母语的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在许多时候，语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如同美国著名词典编撰家韦伯斯特所言“国语是一个国家的标牌”一般，随着欧洲统一程度的加深，欧洲人可能对于这一超级国家的认同也会趋向一致，那时涉及的就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了，文化和语言的认同可能更为重要。为此，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语言政策方面会保证 EU 国家和人民之间有一个更民主的沟通与交流。（p. 60）

毫无疑问，全球化的热潮绝对不会漏掉欧洲这篇美丽的土地。欧洲联盟的建立也是欧洲各国应对全球化的一种策略。那么，全球化对欧洲语言政策产生了哪些影响呢？这是本书第三章的主题。作者首先讲述了他本人和他的家庭的语言使

用情况，以此说明多语性的普遍存在，而且一个人是可以掌握多种语言的。按照哈佛大学的一份研究表明，世界 200 家最大的全球性公司的 CEO 大多能讲多种语言，当然来自英美的除外，其中瑞典和荷兰的能讲三种以上的语言，法国、德国的也差不多会三种左右的语言。世界许多国家的实践说明，如果教育机构组织适当，一个人是不难学会两种或甚至更多的语言的。遗憾的是英国和美国的情况要差很多，特别是美国人的单语种情结更是难以消除，许多一生下来就讲某种“大”语言的人，一般都会有“语言自足”的观念。在各国交往日益增多的今天，这是不足取的。有事实表明，“911 事件”的最终发生是与美国情报机关无法有效地监控用阿拉伯语和普什图语从事的恐怖活动有关的。(p.63) 从 1990 年代开始，西欧国家就致力于通过自己的学校教育让学生能够掌握至少两种以上的语言，这一举措在某些国家，如荷兰和北欧诸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要让大家认识到多语的诸多好处，尚需一定的时日。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目前的语言状况，作者理出了 15 个影响英语在欧洲普及推广的因素(p.64-65)，并且从商业、学术、文化和教育方面详细分析了这些因素，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过程是如何增强英语今天的地位的。同时，通过对某些多语国家语言政策的分析，如比利时、芬兰和瑞士的语言情况，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如果有适宜的语言政策，多语国家内部讲各种语言的人民是可以和平共处、共同进步的，反之处理不好也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纷争，进而影响社会的发展。为了广开思路，作者也为我们介绍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的语言政策，在这三个国家里，英语都是主要语言，但是它们所采取的语言政策都是基于折衷的解决策略，而非通过强硬的手段来消灭其它小语种。特别是澳大利亚和南非的语言政策值得学习。澳大利亚所提倡的 4E 策略（丰富、经济、平等、外部），按照作者的说法，欧洲如果要学习澳洲的做法时，还可以加上第五个 E（即欧洲化）。南非人在深受种族隔离政策之苦后，终于觉醒，其语言政策可能是将语言权利和交流的民主化落实的最好一个国家，语言政策的目标被明文规定为：推进国家统一、强化民主、保护语言权利、推进多语化进程、尊重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推进非洲语言的现代化、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所有的语言政策均建立在如下基本的认识之上 (p.69)：

- ◆ 语言政策是一般社会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
- ◆ 语言是一种资源，而非问题
- ◆ 语言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
- ◆ 国家应该具有发展和保护国民语言权的措施和策略
- ◆ 对于涉及高度敏感的语言实践和应用领域，鼓励说服是比强迫压制更适宜的策略与手段
- ◆ 语言没有优劣，所有语言都是平等的
- ◆ 语言政策的制订和施行需要时间

显然，这些国家的经验不仅对欧洲联盟语言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有益，对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以及其它国际组织，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语言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的所有原则和方法必须事先规定清楚，否则难于实施。

从商业的角度看，英语今天的地位无疑是英美等大力将其作为一种产品在全世界推广的结果。按照 British Council 的说法：“英国真正的黑色金子不是北海的石油，而是英语。长久以来，它是我们文化的根基，现在它正在成为商业和信息领域的全球语言。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充分挖掘它的潜力”。(p.150) 美国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对于“全球化”的理解就是“美国化”，她说：“美国寻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也会有助于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因为美国的价值观是普适的”。(p.75) 今天在全世界各地都不难看到美国的影响，都不难看到英语的影子。相信英语只是偶然才获得今天地位的人们，如果知道这一切原来都是某些国家有意的“商业”和“文化”行为，还会对此视而不见吗？单从商业的角度看，EU 目前的语言政策根本无法抵挡英语的侵入。遗憾的是其它领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在学术领域，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医学和技术领域，几乎所有的论文和专著都是用英语发表的。我们不能简单第责怪学者们的这种行为，因为任何学术研究成果最终都应该编织进人类已有的相关知识网络，这迫使学者们只能使用能够达到更多读者的语言来发表自己的著作。如同全球市场化一般，学术的国际化也成为人类发展的一种必然。为了鼓励学者国际化，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更看重发表在“国际”刊物上的东西。而国际性刊物采用的国际性语言，基本上就是英语。例如，自 1990 年以来，挪威大学引入的成果发表奖励机制规定：用国际语（一般就是英语）写的一本书奖 15000 克朗，而用挪威语的只奖 7000；一篇用英语发表在国际刊物的奖 7000 克朗，而一篇挪威文的只奖 1000 克朗。Ulrich Ammon 编辑的“英语统治下的学术语言”一书，对此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总之，在学术界的情况更为严重，英语几乎已经成为衡量学术水平的一个度量基准了，用其它语言写成的东西大多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这里有一个明显的例子，美国学者 Charles Ferguson 和 Joshua Fishman 被学界誉为“双言”和“语言社会学”研究的奠基人，他们的论文常常被引用。而事实上，他们所提出的这些观点，此前已见于一些用法语写成的文章中，但几乎没有引起学界的任何注意。(p.83) 在这一方面，芬兰的做法值得仿效，他们较好地解决了学术语言的平衡运用问题。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某些德语区的学者提出一些办法，希望能够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见附录五) 我们认为，建立全球性的文摘和题录出版物和数据库，利用语言自动处理系统来检索、翻译、生成相关的文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目前的科学语言问题。作者在分析文化领域的因素时，也提到了语言技术（即我们所说的自然语言处理）对于语言发展的影响，但是他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一种语言在信息时代的生存能力也与它的计算语言学研究水平有关。通过从商业、学术、文化的角度，考察全球化进程中英语的作用，我们不难发现，全球化和美国化正在对所有国家的文化和语言构成威胁。2001 年 12 月 13 日，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表达了他们维护语言多样性和保护弱小语言的决心。我们说，教育机构在所有的语言政策实施方面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本书作者，在提到语言规划的步骤时，将“获得”规划单列一项，便充分说明了教育在落实语言政策中的重要性。从教育方面来分析英语的问题，同样不容乐观。一方面，这是因为教育和以上提到的三种因素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管理正在趋向于企业的管理方式。所谓“企业管理”方式的本质就是一种利益驱动的管理。这种源自北美的方式，使得衡量“一个教授的能力不再是研究和教学能力，而是搞钱的能力”。如果，我们仍然没有忘记赖斯的话，全球化就是美国化。那么，这种企业化大学模式在全球的推广是极为有害的。换言之，一种“金钱驱动”下的学术研究可能不再有更多的学术自由了，而且可能会向有利于“出资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这本身又会强化英语的作用。如果在我们中国都能看到每年有大量的学子投资于诸如“托福”、GRE、“雅思”等考试产业的话，这种现象绝对已经是流行于世界各地了。这当然也会进一步助长英语的势力。欧盟显然不愿意看到英语的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因为它的本意还是想保护自己领地内语言和

文化的多样性。于是乎，他们出台了不少决议来提倡人们多学其它外语（p.96-103），但是这些决议的可操作性不强，缺乏系统性。这些建议大多数都是针对成员国的，而没有考虑 EU 作为一个整体来如何应对英语的挑战。为此，了解 EU 组织语言运用现状是非常必要的。这便是第四章的内容。

如果没有交流和沟通，EU 就不可能存在，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但是如果我们往深想一些，EU 组织内部的交流是用十一种语言进行的<sup>3</sup>，就会发现事情不是如此简单。前面我们说过 EU 设有世界上最大的翻译服务机构，具体数据如下：位于布鲁塞尔和卢森堡的笔译服务部在 2001 年雇佣的专业人员有 1300 人，其中翻译 1219 人，研发、管理、培训等方面的语言学家 81 人。另外还有其它支持人员 524 人，每天大约有 700 个翻译方面的任务，每年大约翻译的资料要多于 120 万页。而这其中的百分之二十是由外聘翻译完成的。各语种的译员数量不等：德语 157 人，法语 144 人，瑞典语 90 人，芬兰语 87 人。另外还有一个联合口译服务部门，为除欧洲议会之外的其它 EU 机构提供口译服务，它雇有全职口译近 500 人，外聘口译 1400 人。在每一个工作日，大约有 750 名口译人员在岗。这些翻译人员至少掌握两种 EU 语言，平均每人掌握的语言差不多为 4 种。口译人员没有专业之分，而笔译大致分为以下专业：法律、经济、金融，农业、渔业、区域政策，对外关系、海关、发展，研究、电信、能源、工业、环境、运输，社会、人力资源、消费者政策，统计、内部市场、企业政策、信息市场、创新。笔译服务是建立在基于数据库的工作流方式上的。使用 SYSTRAN 机器翻译系统作为粗译系统，它可以在 5 种源语和 8 种目标语间进行翻译。在欧盟机关工作的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做语言工作的。所有 EU 机关语言服务的开销占整个 EU 预算的 0.8%，相当于每一位欧洲市民每年要为此服务拿 2 欧元出来。下表为随成员国的增加，涉及的翻译语言对数的变化情况：

语言	语言对的数量
荷兰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	4x3 12
增加：希腊，葡萄牙，西班牙	7x6 42
增加：丹麦语，英语	9x8 72
增加：芬兰语，瑞典语	11x10 110
增加：10 个新的成员国	21x20 420

由此表不难看出，如此多的语言对数，要想做到涉及的所有语言都绝对平等几乎是无法做到的。也就是说，语言的平等只是停留在纸上的一种口号，在 EU 的实际运作中，EU 各成员国语言按照使用频度，依序为：英语、法语、德语、其它语言。以下按照年份统计出来的数字，清楚地说明了在 EU 内部各种语言使用的频度：

- 1970 法语 60%，德语 40%
- 1989 法语 49%，德语 9%，英语 30%，其它语言均没有超过 3%
- 1997 法语 40%，英语 45%
- 2000 法语 33%，英语 55%

<sup>3</sup> 2003 年 4 月 16 日，25 个欧洲国家在希腊签订了“欧洲联盟扩大协定”，在原有的 15 个成员基础上，又增加了波兰、捷克、匈牙利、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塞浦路斯、马耳他这 10 个新成员。新的国家的引入对 EU 原有的语言交流系统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这些数据说明，英语和法语基本上就是目前 EU 内部起草文件所用的语言。按照翻译服务部对 2000 年收到的 1224755 页所需翻译材料的统计，英语占 55%，法语占 33%，德语只占了 4%，其它 8 种语言共占 8%。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语言平等和翻译服务，当然会导致各方面的不满。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EU 是一种全新的“超国家”机构，如果简单地套用单语加翻译的传统模式，是很难满足需要的，我们必须根据全新的思路来构建一个基于平等交流的语言政策。这也是第五章“面向平等交流”的主题。

第五章开始于一位丹麦女部长在以此由她主持的会议上用英语的故事，时值这位部长刚刚上任不久，为此她首先说了一些客套话，如：对有关情况了解不多，还望各位包涵等，其中一句英语是 *I am just at the beginning of my period*，一时传为笑谈。显然，几乎每一位使用过外语交流的人，都会有过诸如此类的尴尬。这是在非平等语言交流场景中常见的一幕，有时会令当事人非常难堪。据此，作者认为 EU 机构语言政策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保证所有的交际者具有平等的交际权利。如何建立一个基于平等的语言政策？作者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 ◆ 语言政策的目标和前提，以及影响它们的因素，
- ◆ 语言的政治学，金钱与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的相似性，
- ◆ 语言权也是人权，
- ◆ EU 的语言权现状，欧洲法院审理的有关案例分析，
- ◆ 两种语言政策比较：采用英语的模式和语言生态模式，
- ◆ 英语的标准问题，使用何种英语作为 *lingua franca*，
- ◆ 世界语能够在讲不同语言的人之间创造一种民主的交流场景。

对于这些问题的详细考察和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理性，但可行的 EU 语言政策。通过这些分析，我们看到了希望，但愿“Daily Mail”（每日邮报）的下列说法永远只是英国人的一个美丽梦想：“假如欧洲要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么，只有共同的货币、共同的对外政策、共同的法律体系是不够的。它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语言。这语言非英语莫属。”（1991-11-14）一个平等的语言交流模式，只能是建立在中立语言的基础之上。当严肃的语言学家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人类几百年来为共同语奋斗的另一个领域时，原来理想的解决办法就在眼前，这领域就是国际语语言学（*Interlinguistics*），这语言就是世界语（*Esperanto*）。虽然，许多的语言学家们说世界语根本不值得一提，因为没有一个人的人拿它当母语，没有英美的经济实力作后盾，谁会支持它呢？许多人又说，世界语只是一些理想主义者的宠物，在现实中毫无用处。所有这些对于世界语的指责，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都是对世界语的赞扬。因为我们寻求的正是一种中立的语言，只有这样的语言作为国际交流工具才会满足本书提出的所有解题约束条件。至于理想，那更是人类所具有的根本属性，我们没有理由谴责人类的理想。我们高兴地看到，本书作者在参加了 1996 年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之后，对世界语的和现状有了切实的了解。为此，将它作为一种提供平等交流的语言展现在读者面前。相信任何理性的语言学家和其他读者，在看了书中的有关章节后，都会说“这就是唯一的正解”。正如，国际世界语大会“布拉格宣言”中所说的那样，世界语与其它人类语言一样，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这只是发展中的问题，因为它的本质是“民主交流的语言”，是“保护语言权的语言”，这难道还不够吗？事实



上，世界语曾经有过登上国际舞台的机会，在 1920-24 年间，国际联盟讨论过采用世界语作为工作语言的问题，并得到了不少国家的支持，后因以法国为首的有些国家的反对，而没有通过。遗憾的是法国人没能保住法语作为外交语言的地位，把它赶下台的是英语，而不是世界语。本书在列举了以上故事后，给出了某些世界语所具有的社会语言学特点。有关世界语的文献已有很多，感兴趣者，可通过任何网络搜索引擎查找相关内容。一本较新的国际语学和世界语学文集（Fiedler/Liu 2001），其完整版本可在互联网上读到（<http://www.esperantic.org>）。最后，作者提议在 EU 内将世界语作为一种口译的中间语言和文件的起草语言来使用，这显然不但能够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也有助于维护 EU 各语言间的平等。我们认为作为一种过渡性方案，作者的提议是可取的。作者本人也认为一种能够为不同语言背景的人，提供对称交流的国际语，在达到交流目的的同时，又没有危及其它语言，这对于 EU 应该是极具吸引力的。

每一位研究语言人权和语言多样性的学者，对于世界语言状况的分析，对于英语今天强势地位的担忧，几乎都是差不多的。我们已经看到过太多的社会语言学家的有关著作了，如果没有一个更合适的、真正能够构造一个平等的语言交流世界的解决办法，所有的理论研究都是没有用的，英语仍然会沿着自己的轨迹越来越强大。如果我们希望政治家有一天能够理性地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学者们必须提出可供选用解决办法。本书与许多其它有关语言政策的学术著作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作者提出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提出了一系列的语言政策建议。这些建议构成本书的最后一章。

在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议前，作者认为欧洲语言政策必须要考虑以下方面的问题：社会语言学的现实，策略实施的成本，遵循的基本原则，可操作性和效率，政治因素。为此作者分别列出了最差和最好的语言政策，按照给出的指标看，当然目前的政策基本上就是最差的了。综合本书讨论过的诸多因素，作者给出了 45 条建议，这些建议分属以下部分：国家和超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架构，EU 机构，语言的教与学，学术研究。我们应该承认，如果 EU 的政治家和语言问题的决策者能够看到这本书，并且能够按照这些建议行事的话，那么 EU 的语言政策会逐渐趋于合理。但是语言问题实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句话道出了我们的疑问，“不论是在联盟还是国家一级，如果欧洲继续当前对语言领域的不闻不问政策，那么等待我们的可能就是一个美国英语的欧洲。这真的就是欧洲的人民和领导者们所期待的新欧洲吗？”

正文之后的五个附录是：欧洲联盟语言多样性和多语问题（1995），推进语言多样性和语言学习的决议草案（2001），欧洲议会席位分配表，Oegstgeest 宣言（2000），欧洲语言政策的维也纳宣言。另有 25 页的注释，为读者提供了大量补充信息，值得注意本书没有专门的参考文献部分，有关文献信息也需在注释部分寻找。最后是有助于读者查找内容的主题索引。

总而言之，这是一本适时出版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学术著作。虽然，书的主题是欧洲统一进程中的语言问题，但是许多内容对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读者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全球化进程中的英语问题已经不再只是美洲的问题，也不再只是欧洲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sup>4</sup>。作者用翔实的资料，客观的分析，理性的思考，为我们勾画出一幅令人担忧，但又充满希望的图景。作为一

---

<sup>4</sup> 在我结束这篇读书笔记的下午，我通过互联网访问北京图书馆，想查询是否北图已有本书。很幸运我在数据库里发现了它的踪迹。但是书名的中译文变成了“英语-只属于欧洲吗？语言政策挑战”，你从这个译名中看到了什么呢？由此，我更有理由相信这本书对于我们中国的读者，同样具有很深的意义。

本学术著作，能做的也不过如此了。至于是否 EU 会采用理性的方法，制订和实施恰当的语言政策，从而维护欧洲语言和文化的五彩斑斓，还是继续现在的放任自流策略，任由英语吞噬这些无助的文化和语言？这些问题，谁也无法回答。因为今天“学术的‘真’，往往会服从于经济的‘真’”（p.178）。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英语在国际交流中地位的读者，可参考 Hübler (1985)。有关欧洲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问题，也可参考 Arntz (1998)。Kersaudy(2001)对欧洲语言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做了许多有趣的分析，值得一读，另外书末 39 种欧洲语言词汇对照表，有利于了解这些语言词汇之间的异同，其中还有题为“一小时学会世界语”的一个章节，更是把解决欧洲语言问题的钥匙交给了读者。

### 参考文献

Arntz, Reiner (1998) *Das Vielsprachige Europa. Eine Herausforderung für Sprachpolitik und Sprachplanung*. Hildesheim: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Cooper, Robert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edler, Sabine/ Liu, Haitao (2001): *Interlingvistikaj Studoj. Interlinguistische Studien. Festschrift für Detlev Blanke zum 60. Geburtstag. Festlibro omagxe al la 60-jariĝo de Detlev Blanke*. Dobřichovice: KAVA-PECH.

Fill, Alwin (1993). *Ökologikum. Eine Einführung*.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Hübler, Axel (1985): *Einander verstehen. Englisch im Kontext internationaler Kommunikation*. Tübingen: Gunter Narr.

Kersaudy, Georges (2001) *Langues sans frontières. À la découverte des langues de l'Europe*. Paris: Autrement.

Miklos Kontra, Robert Phillipson, Tove Skutnabb-Kangas, Tibor Varady. (Eds.). 1999. *Language: A Right and a Resource. Approaching Linguistic Human Rights*.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Maffi, Luisa, ed. (2001) *On Biocultural Diversity: Linking Language, Knowledge, and the Environmen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Skutnabb-Kangas, Tove (2000). *Linguistic genocide in education - or worldwide diversity and human rights?* Mahwah, NJ & London, UK: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Sutherland, W.J. (2003) Parallel extinction risk and global distribution of languages and species. *Nature* 423, 276-279